

文化与传播

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编

WENHUA
YU CHUANBO



上海文化出版社

文化与传播

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传播系主编

献给深圳大学建校十周年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4 号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朱展程

文化与传播 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传播系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红 专 书 店 经 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插页 3 字数 340,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册

ISBN 7-80511-603-2/C·31 定价：9.80 元

学术顾问

张岱年

季羨林

汤一介

李学勤

蔡德麟

胡经之

江曾培

郑 锴

主编

章必功

副主编

景海峰

郭纪金

郁龙余

编委

陈乃刚

钱学烈

林 岗

熊源伟

张卫东

吴予敏

杨移貽

顾承甫

陈 征

文化主流或文化傳播是
促進人類社會發展之重
要動力之一 如近年
本集刊有助於我國之
社會建設事業

李燕林



一九九三年

六月二日

为《文化与传播》题词：

文化的发展有待于交流，文化的交流又有待于传播。努力吸取世界文化的先进成就，同时对外宣传中华文化的精神内容，这是我们的今天的重要任务。敬祝

《文化与传播》创刊！

張岱年

1992年7月

论文化与传播

(代发刊词)

蔡德麟

由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文化与传播》同读者见面了。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汇聚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命运,探讨中外文化的异同和互补,探讨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亚太经济圈的崛起中,华夏文明的振新和发展的问題,是一件很有意义和兴味的事情。

主办者将“文化”和“传播”这两个词连缀起来,显示了这一集刊的学术旨趣和特色。“文化”所包容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从器物工具到语言媒介,从制度结构到思想观念,大凡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纳入到文化范畴。研究文化,我们应当将历史的观点和辩证逻辑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倡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回溯以往的文化研究,似乎从“文化”与“传播”的相关性方面入手的,还不多见。我以为,切入这一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只是某种单一的角度或学科的拓进,恰恰是出于对“文化”的新的认知和把握。集刊的主办者以他们独到的眼光,打开了一个认识观察文化的新的角度,出了一个好

的讨论课题,我想顺势谈谈自己的一些不尽成熟的看法。

首先,我们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上去体认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从静态维度上看,文化就是传统,是文明的积累、实践的积淀的产物,是复杂的文化要素长期整合的凝聚形态。无论是穿过每一时代的屏障去追溯文明源头,还是从现实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发掘文明底蕴,都无非是要探寻出构造某一文化类型生命的基本元素,从而概括此一文化的特质,说明她何以生存、何以消解、何以变异。正是透过文化的特异性和相对静止性,我们才可能去把握她。但是,仅仅这样来认识文化,得出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文化,更是一个生动的流变的进程。文化内涵中诸项要素、层面的矛盾冲突,此一文化与彼一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推动了文化的生命进程。文化的流变,是与传播密切相关的。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通过空间的播散和时间的传承存活下来的。而文化的播散和传承,根本上依赖于造就此一文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同地理环境、人口迁徙、战争兼并、交通贸易、宗教传播等等密切相关。所谓华夏文化,在古代,是融合了东夷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百越文化等等周边文化的结果,是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共同的创造。从战国到汉代,华夏文化大体上完成了她结构和功能的整合,完成了制度和价值系统的建构,相对稳定下来,在以后的近两千年中,制约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心理方式。正如世界上任何一种强大的统一文化一样,一经形成就势必向外播散拓展,因而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文化发生接触、碰撞、交流。古代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限制,主要是与中亚细亚乃至大陆欧洲文化(泛称“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相接触,发生相互影响。两汉南北朝以后的中国园艺农

业、手工业、城市建筑、商旅贸易、音乐歌舞等等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而印度佛教文化，使中国哲学、宗教、逻辑学、语言文学的面貌也大大改观，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正是特定文化类型的塑造、整合、凝聚、拓展、调适的过程。在“文化”和“传播”之间搭桥，无非是强调用更生动、变化、全面的观点来体认中国文化，用动态的描述分析去说明、阐释相对静止的形态，以揭示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诸多的可能性。

其次，我们需要研究文化的传播和传播的文化两个方面。文化的传播盖指某一文化的要素、内涵或精神的流传、播散。这相当于近代文化人类学所说的 diffusion(传播)一词的含义。任何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伴随着它的内外双向的传播过程。从工具器物、语言媒介，到生活方式、观念形态、组织体制，都无不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的展开而流传。在世界发生现代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之前的悠久年代中，这种文化的传播要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不得经过漫长的时间隧道。而且，文化的传播还需要很多别的催化因素，如战争、灾疫、政权易替、民族迁徙等等，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往往如恶梦一般，但是当人们应对历史事件的挑战而采取积极的反应行动时，也会造成令人惊异的文化传播的成果。西汉王朝的对外扩张战争，有助于打通中国与西域的文明通道；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曾有助于北方先进农业文明向南方的流传。这样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是很多的。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的传播，一度将其视为文化研究的根本问题。有人认为文化传播乃是一个文化的动力过程，一种文化超越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区域传递到另一社会区域，造成了文化的相似性。在文化的传播中，一方面是作为主导的动力型的文化对被主导的接受型文化的影响，影响

所及几乎就是前者的文化扩张；另一方面是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被整合、涵化于新的文化区域，造成原有文化形态的改变。文化的传播过程，包括了传播与接受、影响与涵化、冲突与整合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西方文化人类学中，曾经有过极端的文化传播理论，如英国的传播论和德奥文化历史学派。这些学派错误地将文化传播看作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文化传播均是由一个或几个文化中心向周边扩张，形成不同的“文化圈”。有所谓欧洲中心论、埃及文化中心论等说法。这些错误观点，在学术上早已站不住脚。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对于任何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和独特性的科学说明。文化的传播是在文化的根本动力的基点上才发生影响的。因而，我们重视文化的传播现象，但不能将它绝对化。世界不同民族的文明的进步都有其特殊性，我们既要肯定文明进步的客观物质尺度，也要充分尊重文明进步的价值相对性尺度。

传播的文化，与上面说的文化的传播在含义上是不同的。传播一词，不仅有 diffusion(播散)的意思，还有 communication(传达、交流)的意思。文化，不仅仅只是器物工具、制度组织、精神价值这几个层面。文化将人类同自然界的天然的直接性的联系中分离出来，使她能通过分类来感知、通过逻辑来理解、通过象征来描述和传达她的经验世界。文化创造出一种可以分享、学习和继承的体系去更有效地协调组织人们的社会实践。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许多文化学者致力于开拓新的文化研究视野，把文化作为人类传达与交流信息的体系来把握。人类创造了语言作为传达与信息交流的符号系统，而且广泛的非语言文化现象，如服饰、食品、住宅、建筑、工艺、礼仪、习俗等等，都可以被看

作文化符号，它们也都有各自的文法结构和传播功能。一些富于创造智慧的学者，开始不满足于仅仅用“结构—功能”的方法分析文化，而试图通过文化的符号系统的读解，进入人类的文化“思维—行为”的深层世界，以此揭示人类社会实践行为的根据。这即是研究所谓“传播的文化”。从“文化的传播”到“传播的文化”，绝不只是关于“传播”概念的不同语义的区别，这反映了人们对于文化的观察认识，由宏观到微观、由表层到深层的拓进。毫无疑问，语言和思维是人们诸多文化行为的内在根据；而任何文化都具有泛符号化和泛象征化的倾向，此一倾向形成了丰富多样又很有系统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蕴藏着深刻的文化精神。这一切都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交流不断地被复写、被改进而延续下来了。我们应当特别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其三，将“文化”与“传播”相联系使我想到了，在文化研究中，有可能把价值系统的研究和工具系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尽管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个内涵宽泛的概念，但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应该是指决定了从属于特定文化类型的人们心理——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念体系。任何一种稳定的文化类型，都有极为坚固、深厚、丰富的价值观念体系作为内核灵魂。区别此一文化与彼一文化的不同，倘若拂去诸多表相的差异，我们发现最根本的是价值取向的不同，建构文化价值体系的基本概念和思维逻辑的不同。中国人特有的自然观、宇宙观、生命观、历史观、社会观、伦理观、政治观、宗教观、艺术观、经济观等等，都无一不是由文化价值核心衍射的。我们需要以历史的观点来说明文化价值体系产生的必然性，以客观的和辩证的观点，分析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和精髓。我们赞成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和方法，而不

赞成非历史的非科学的态度。无论是肤浅的妄自尊大还是迂腐的妄自尊大，都是不可取的。就文化价值体系产生的不可选择的历史条件而言，可以说任何文化价值体系都有其合理性的方面。此一文化核心确立之后，势必对人们的一切社会实践行为发生支配制约的作用。当我们研究人们的技艺交流、语言沟通、礼仪交际、器物流传、文字传播、经典教授、文献阐释、商贸往来、舆论散布等等日常信息交流方式时，都会发现价值体系的支配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文化的变迁，都是先从表层、局部逐渐发生的。日常的信息交流，是人们除衣食住行外的另一项最基本的生活内容，具有工具的性质。它是最为敏感地表现文化变迁状况的。研究工具系统的变化，也会使我们了解到文化的走向、变迁的层次、广度和深度。中国哲学里，对于“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有十分精深的研究。所谓“道器不离”、“体用不二”，注重对立范畴的同一性，正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实用理性的性格。从某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价值系统和工具系统的概念划分，是现代的说法，含义较传统说法要明晰一些。在研究文化时，运用不同的学科的方法，将这两个系统的分析批判沟通起来，使之互证互补，令我们对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会有更好的体认。

从以往的许多文化研究中，我们体会到，剖析阐释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常常是与研究者本身的主观选择、情感态度分不开的。分析中有偏重有倾向，评说中有贬斥有赞同。学者的文化价值观自然渗透在他对既往文化价值的反思当中。这种文化研究的主观性，从哲学上说，是文化阐释主体同他面对的历史客体之间在体认和阐释过程中所建立的某种“主观际”性的关系。我以为，不能将此种“主观际”性状态理解为纯粹主观的或者纯粹

客观的状态。它是介于主客观之间的某种认知和体验状态。其中有不可更移的历史客观内容,而此种历史客观内容,却又是被文化阐释主体的主观选择、把握和领悟的。因而,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阐释、研究,势必带着分明的时代感和创造个性。相对于价值系统的研究,当学者着手从工具层面契入文化时,他可以采取更加严格精确的科学方法,如统计、调查、实验、典型分析、抽样分析等等,他将呈现于表面的社会文化行为及其结果归纳起来,以见出文化发展的广度、深度、规模和状态。这两种研究,反映着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的特点。当代的文化学研究,有一种综合化的趋势,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分野不再那样严格。研究文化价值体系,不能不更多地注意历史真实和社会真实;而研究文化的工具系统,不能不更多地注意精神观念对历史和社会行为的制约影响。把坚实严谨的科学性与富于颖悟和洞察的创造性结合起来的的文化研究,正是我们所企望的。

将文化的批判分为价值批判和工具批判两个层面,这就势必涉及到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以社会意识形态概念涵盖文化概念的倾向。诸如所谓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都无不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打着阶级的烙印的说法,所谓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的说法,都是以社会意识形态涵盖文化。因此,文化的概念被局限为精神观念,再进一步局限为阶级思想。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简单化的曲解。前几年国内出现了“文化热”,学术界重新提出“大文化”的概念,这是对长期以来用意识形态理论代替文化观的倾向的反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了以“大文化”观否定意识形态理论的偏向。不承认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对特定时代社会精神文化的主导作用。事实上,社会文化

是十分复杂的。有些文化层面、内涵是依赖于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有些则不完全依赖于阶级关系，有更广泛更悠久的特征。例如，就语言文化的工具性质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并不依存于社会意识形态；但是当运用它来表达价值观念时，往往就可能有阶级性，有时甚至语言工具类型本身的使用也可能成为阶级生活的标志。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世族的南迁，造成地主阶级集团的分化和组合。是否“操吴音”在当时就成了区别不同世族集团的标志。再如，传播信息的工具、渠道本身是超意识形态、超阶级的，但是对于媒介工具的垄断、渠道的控制就与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相联系。社会意识形态说到底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它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谋求文化的优势，主导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精神面貌。但是社会意识形态并不能代表当时的一切社会思想。它的主导作用在文化的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上发挥也是不均衡的。有时强些，有时弱些。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想有冲突、支配的一面，也有相互同一、融合的一面。非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及其他文明要素，在任何时候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文化这一个大系统，是主导元素与多项元素的大汇合。研究文化，我们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系统的辩证的观点看问题。

其四，〈文化与传播〉这一集刊，将我们的视野带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部，启示一代学人应当肩负的弘扬中国文化的神圣使命。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璀璨的成果之一，她不仅在中古时代走在世界其他文明前列，辐射到周边邻国，奠定了那里的文化根基，而且，在公元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对于正在觉醒中的欧洲近代文化，也贡献了她的创造发明和她的启迪作用。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区域内,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当海洋贸易、工业革命刺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崛起之后,中国文化——这一迄今世界上唯一存活的古文明,面临着挑战和危机。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拯救自我生存的历史。政治革命、社会风潮、文化启蒙,此起彼伏,目不暇接;“保存国粹”、“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文化本位”,各类学说主张,众说纷纭,色彩纷呈……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曲折过程中的自我扬弃、自我调适和艰难探索。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对封建主义的激烈批判,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提到一个崭新的境界。此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传入中国,她的真理的光辉廓清了以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文化模式来塑造中国现代文化的谬误。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灿烂成果。她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包含着扬弃和继承。马克思主义不是东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最终通过中国社会的危机传入中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传播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历史走向发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来文化的影响。马克思借助当时西方学者对东方和中国的研究成果,曾经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作过深刻的洞察把握。但是这些论断却是在很久以后才为中国人所注意。中国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俄国和日本思想家的传播来了解马克思的。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俄国化了。这对于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同样是极为深远的。以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花了很大力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找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条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也是一个关于文化与传播的大题目，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要返回马克思（甚或青年马克思）。我们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全部内因和外因条件，她的东渐过程，包括通过列宁主义的俄国化而影响中国，更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结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我们应当怎样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分析、鉴别、扬弃它们，将其优秀元素整合于中国的新文化。

世界已进入了九十年代，正跨向二十一世纪。蓬勃发展的高科技和经济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社会生产力的性质、规模和发展速度，行将进入崭新的质的阶段。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及产品的普遍智能化，软件系统日益成为工业系统、各种经济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的控制中枢，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工业化时代走向信息化时代。信息，是现代社会生产力中最富活力的崭新因素，信息传播不仅使信息产业本身得到巨大增长，而且使一、二次产业重新恢复其生命力，实现了工业革命。传播信息即意味着信息价值的增值，决定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信息时代，也是各种文化交融、多元文化并茂的时代。技术、信息和资本正跨越国界大规模迅速地流动，导致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封闭的经济文化区域已经打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生存竞争能力，取决于她的人力资源的质量，她的人民吸收、掌握、运用、传播、创新文化的能力，现在不只是文化形态决定了社会的信息传播形态，更是信息传播形态决定了文化形态。中国文化（包括我们业已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发展际遇。

进入信息时代，不仅技术信息和经济信息决定了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信息也势必不断刺激、扩大对生产和经济的新需求。生产、消费、科学实验、教育、社会工程等等都日趋具有高度的文化性质。人们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协调，经济与艺术的统一。愈是具备文化个性的东西，将愈具有开发利用的价值。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显示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优势。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与我们经济政治制度不同，但在传统上是华夏文化圈的从属部分。日本和韩国，也是由华夏文化奠定其文化根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学习西方文化，发展经济的同时，仍旧特别注重传统文化，利用改造传统，使之融于现代社会的创建，由此产生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效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在效绩上却超过了西方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来，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开放地区，创造了自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些率先改革的地区在迅速完成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同时，社会变革的前锋已经在追踪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的时代步伐。在这种急速推进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没有经历许多工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分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技术文明、法理文明的大量引进，并没有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没有摒弃民族文化传统，相反，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文化，却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外文化的双向传播。拿深圳来说，她既是吸收引进外来的文明成果的窗口，也是我们传播弘扬中国文化的窗口。借着这一窗口，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多姿多